

掌故叢書第二種
陳紀澄 著

胡政之與大公報

掌故出版社出版

掌故叢書第二種
陳紀澄著

胡政之與大公報

掌故出版社出版

「胡政之與大公報」目錄

胡夫人的四封信（代序）

一、引言	一
二、再彈衷曲	一
三、新聞企業	九
四、最初接觸	一五
五、由東北至上海	一七
六、初晤國聞通訊社	二六
七、秘密採訪僞滿政情前後	三〇
八、一日之內寫了三萬多字	三七
九、大公報的編輯部	四三
一〇、平地起風波	四七
一一、何心冷之死	五一
	五六

一二、我的工作	六一
一三、關於署名	六六
一四、會計與人事	六八
一五、國聞通訊社創立經過	七四
一六、國聞週報	八三
一七、一個插曲	九一
一八、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	九六
一九、怎樣公諸大眾	一〇六
二〇、「不盲」的含義	一一七
二一、關於費彝民	一二二
二二、大公報編輯部素描	一三五
二三、曹谷冰、王芸生、楊歷樵等	一四三
二四、我的收穫	一五〇
二五、回到鄉下	一五九
二六、中日關係微妙階段中的危機	一六一

二七、藏本案	一七〇
二八、大光報的誕生	一七四
二九、一片陰霾下的中日情勢	一八一
三〇、二二六事件	一九五
三一、京粵意見分歧	一九八
三二、大公報上海版的開闢	二〇〇
三三、國內外新形勢	二〇九
三四、大公報復刊十年	二一三
三五、西安事變時之大公報	二一七
三六、沈鈞儒等案	二三五
三七、抗戰爆發	二四一
三八、大批作家羣集武漢	二五四
三九、上海撤守與南京淪陷	二六〇
四〇、香港版的開闢與人員的調配	二八一
四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成立	二八八

四二、台兒莊大捷·····	二九六
四三、范長江的被辭退·····	三〇〇
四四、新疆採訪·····	三一〇
四五、大公報渝版發刊前後·····	三二六
四六、後記·····	三三三
出版後記·····	三三五

胡夫人的四封信（代序）

陳紀澄

「胡政之與大公報」一文，係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二十四日開始刊載於台北市中華日報，於當年六月十六日刊完。因海外讀者亟須閱讀此文，因商請至友何家驊（岳齋）兄在「掌故」月刊再行發表，以期普遍。並將前文若干疏漏改正，再加補充，成為現在出版的這本書。

這本書是我所寫有關「大公報」的三本書之一，也是最主要的一本。前一本是「報人張季鸞」，出版於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再版；六十年（一九七一）發行三版。另一本的文稿正在傳記文學刊載，題名是「重慶時代的大公報」。這三本書合起來，可以說是「大公報」的一部光榮歷史，或稱之為「中華民國最重要的時期」，也無不當。因為自民國十五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二六——一九四五）中間，歷經國民革命軍北伐、南北統一、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以及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府還都南京等等。這些事不但關係着中國歷史的絕續，民族存亡；時代的更易；也是中國人民忍受煎熬、感受最深、血淚交織、榮辱互見的一個空前階段。

但前後兩本書，限於人物與時間，不能做全盤的交代，唯有本書最足以反映這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時代。所以作者個人深以本書能夠印行為半生最大榮幸！

作者近二十多年的興趣，原已由記述轉向為小說。可是在發揮想像力之餘，總感覺尚有許多真人真事，無人撰記，更無人傳揚，似乎我有一份難以推卸的責任。於是忍不住一面寫小說，一面還要寫些值得向人報告的事體。有關「大公報」的文字與若干遊記，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有一位老朋友曾奚落我：「你就會寫『大公報』！『大公報』已被毛共御用為傳聲筒，在海外成了統戰的工具，你還寫它幹嘛！」我答：「對了，當年我沒有做『職業報人』，有人批評我是一大敗筆；但我僥倖做了『票友記者』，才有資格和機會來記述『大公報』；我若是當了『職業報人』，恐怕這些文章都無法寫，更沒有機會寫。我更無法使真正的『大公報』光榮歷史，在年老一代讀者中存有記憶，使年輕一代有所追尋；尤其絕對沒有辦法使人辨別真偽，和重估它的言論價值。因為老的、真的『大公報』早已死亡了！所以我今天，特別安慰，特別覺着以發揚傳播當年『大公報』的精神為榮！我對於做了十五年的『票友記者』無絲毫遺憾！」

承岳騫兄的愛護，本書在掌故刊行期間，一再譽揚。因為「掌故」發行的普遍，使

我有了意外收穫，那就是因本文找到了胡夫人胡顧俊琦女士這樁事。

六十三年三月六日，我忽然接到胡夫人自紐約來的一封信，內容如下：

紀澄先生大鑒：敬啓者：敝人數月前，偶在紐約中國城書鋪，購到香港出版之『掌故』雜誌第二十六期，讀到大作『胡政之與大公報』。其後又陸續購到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幾期，均繼續刊載。前星期又讀到『傳記文學』雜誌二十三卷第六期，六十二年十二月份『重慶時代的大公報』，內有前記一節中，曾提及前文係發表於中華日報副刊，不知是否『掌故』雜誌轉載該文？不知有否單印本出版？竊思先夫逝世於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迄今已逾二十載，刻下讀到大作『重慶時代的大公報』回憶往日情景，歷歷在目，撫今追昔，倍增傷感！加以賤軀近常鬧病，體力日衰，猶能及時讀到先夫往日事業之片段，頗堪告慰。所謂一生一死，乃見交情，衷心感激，實匪拙筆所能表達萬一！草草不恭，敬此道謝。即請

撰安

胡顧俊琦敬上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註：先夫乃係肝病、肝硬化，最後為腹脹病。貴府地址乃係得自鄧建中太太，他們夫婦，我們時在中國教堂中見面的。又及。

×

×

×

我等着胡夫人這封信後，喜出望外，急速回信，並探詢一切。不久，我就得到她於

四月十八日的第二封信，內容如下——

紀澄先生台鑒：前接大函，欣慰奚似！本擬早日作覆，奈賤軀近患胃及胆石病，以致飲食減少，體重驟降（輕了二十磅），精神不佳。加之因在工作關係，又不能休息，遲遲作覆，尚祈原諒！不日預備去醫院檢查後，即行開刀。謹將關於先夫之事，畧述如下：

先夫所有手札書籍，因鄙人於一九五一年春，隻身到香港，因係偷逃，除帶少數川資之外，身無長物。因當時里弄組織很嚴，時遭監視，予佯為散步街頭，跳上電車到南市車站，購了一張普通車票到廣州，（那時臥車票需預訂，並須答覆詢問。）再行設法到港。關於先夫照片，就是雜誌上登載之西裝照片，我處亦未有。唯一有兩張照片，乃係先夫參加聯合國時簽字之照片，乃係前兩年因親戚在聯合國工作代為複印，贈我兩張，容作紀念而已。若先生需要，當可寄上。先夫兒女，除予生一子，由共黨處托友人設法帶出（一九五二年），其時小兒德生祇九歲左右，其他兒女，因已婚嫁，均留國內未有出來，亦從未與他們通信。因先夫共有五女三子，除幼兒德生已讀完建築工程碩士學位外，並已結婚，已有兩個小孩，刻在密歇根工作。他已考得執照，與老板合開一公司。予則一人在紐約，在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即前中國銀行）做一僱員，聊資餬口而已。

先夫之弟選之（以前在兵工署為俞大維之屬下），在上海淪陷時留滬，後與友人合作做些生意，自「三反」、「五反」後，即無消息。先夫弟兄共三人，長兄鑑之，留在家鄉四川成都。他們有祖田百畝，後遭清算，要他們償還一百年前到目前之租金，由親友湊錢繳清，才算了事。幸其小兒為民盟黨員，比較上還客氣，未加公審與受刑。報館同仁，在港地完全由費××以先夫用二十萬美元在加拿大與美國所定購之印刷機經營。但機器運到時，先夫已過世。上海淪陷後，他拿這些東西，做為投共之資本。總之，一言難盡矣！容開刀，體力恢復後，再行奉告。匆頌

撰安

胡顧俊琦上

四月十八日

×

×

×

這封信，把她如何逃離上海，及胡氏家庭情形予以補充。鑑之先生行一，我沒見過；選之先生行三，在重慶時常常見面，跟政之先生面貌相似。胡氏前室子女在天津與重慶都見過，但對大小姐印象獨深，因為她會唱平劇，還是唱老生的。其餘却印象模糊了。這位胡夫人是因胡氏前室因病逝世後，在抗戰初期續弦的。夫人江蘇吳縣人，為外交界耆宿顧維鈞（少川）氏的堂妹，出身望族，幼受庭訓，受過高等教育，氣質不凡，而端莊蘊藉，備受人尊敬。

× × ×

我接信後，一面謝她，給我提供了許多資料；一面問候她的病情。不久，我收到她第三封信，內容如下——

紀澄先生台鑒：前星期接奉大札，敬悉一一，諸蒙關切，不勝感謝。賤軀日來尚好，故未開刀，因醫生出門度假，擬等候渠返紐約，看有無牀位再入院也。此地一切手術費及醫生等費，價格均奇昂。看病時，醫生先問職業地位等，並不先問病源，生病真是生不起！

先夫政之照片今日已航寄一張，因底片在聯合國照像部內，私人不能隨便索要，以前因有友人在內工作，現下×黨加入，諸多不便；寄奉一張，乃係有兩張之故，敬贈先生留念可也。

令郎令媛等在紐約住處，確離舍間甚近；但在美國的人個個忙忙碌碌，年輕人更甚。鄧家夫婦，除了在教堂遇見外，平日亦少往來。因平時大家都有工作，週末又忙於家事，加之又去教堂等，更是沒有多餘時間，應酬等等遂極少矣。

以後若有機會，定當回祖國台灣一遊。據聞生活較之美國舒適多了；聞最近亦較前物價高漲甚多，確否？

此星期日若能進院開刀，就需要休養一些日子，才能恢復工作。匆匆草此，尚祈原諒。敬請 近安 胡顧俊琦敬上 六月六日

× × ×

前信內所談鄧建中氏，乃作者重慶時代之老友，吉林人，燕大畢業。在渝市南岸黃角壩曾創辦南山中小學校，我的弟女三人都是他的學生。他並且曾創辦南山協和醫院，擁有衆多名醫，濟世活人，造福不淺。他也是當時渝市教育界領袖之一。但大陸淪陷後，共黨逼他獻產，又誘迫他的夫人北上，中途失蹤，家破人亡，一生積蓄，全部奉獻於「人民政府」。但鄧氏並未灰心，隻身逃出大陸，先在東京盟軍總部任翻譯官，後去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中文，又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學位。最後以經商未成功，却因此患中風，行路不便，至今尚未復元。作者每次至紐約必去探望他，回首前塵，唏噓不盡。他與新娶夫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每個星期天必到紐約西城，由中國人領導的一個教會，去作禮拜。中國信徒也藉此互相見見面，算是海外中國人活動方式之一。

× × ×

我接信後，即去信囑小兒庭標前往探望。嗣又得胡夫人八月廿二日大札（第四封信），內容如次——

紀蓮先生台鑒：前接大札，因病中未即覆信，歉仄奚似！我於六月九日入醫院，十三日動手術，割除膽囊，因上麻藥過多，傷及肺部，即發高燒，住急救房一週，方轉移普通病房。住院期間，承令郎携鮮花來探訪。據云係奉尊命而來，實不勝感謝之至！三週後勉強出院，當時仍有極高熱度，幸在家休養，熱度才退。現在逐漸恢復體力，於上週已上班，但仍不能勞累，知關錦注，特以奉聞，並此道謝。即請

近安

胡顧俊琦敬上

八月廿二日

× × ×

以上這四封信，是我意外的收穫，對於胡氏生前死後又得到不少資料，真是難能可貴！如果不是「掌故」發行普遍！我怎能有此重大收穫呢？現在我因時間關係，未能徵得胡夫人同意，就擅自把她的信公佈出來，一方面很惶恐，另一方面也覺得很榮幸。在胡氏去世二十五年以後，我能以一篇小文，居然找到她夫人的蹤跡，而又能與他的舊屬發生聯繫，想政之先生在天之靈也獲得一些安慰吧！

最後要再感謝岳騫兄的盛意，於刊載完畢，仍能集結出版。在此能源危機並未渡過，而紙價、排工一切高漲的現階段，有此魄力，除了感激之外，實無多餘的廢話再說。

（民國六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於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木柵區興隆山莊）

胡政之與大公報

胡霖，字政之，四川華陽縣人，生於民國前二十三年，歿於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文章自古誇西蜀，事業於今勝北巖。」

——曾琦

一、引言

中國青年黨創始人之一曾琦（慕韓）先生，於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在香港所撰「敬悼畢生盡瘁新聞事業之張季鸞先生」一文中，曾有這麼一段話：「季鸞先生投身報界雖逾三十載，然其成功則在十五年大公報改組以後；僅十五年之時間，遂博得密蘇里之獎章而馳聲於國際，此雖季鸞先生心血所致，而其同事胡政之先生策劃亦大有力焉。政之先生曾環遊世界各國，考察新聞事業，於辦報事，心精力果，得未曾有。吾人於『七七』以後見大公報之移漢移渝，同時復在港在桂設分館，頗驚其辦事之敏銳，計劃之周詳，較之軍隊退却，另尋據點，秩序井然，曾何多讓。該報渝館迭遭轟炸，照常營業



說明

胡政之先生於

一九四五年出席舊

金山聯合國製憲大

會時攝影。

胡氏正在憲章

上簽名。背後自右

起：李璜、張君勱

、張彭春及美籍人

士（姓名不詳）。

，其編輯發行兩部職員之犧牲奮鬥精神，誠不愧張、胡兩先生之領導。余嘗謂政之先生之於大公報，有類英國北巖爵士之於『泰晤士報』，而季鸞先生則頗似日本德富蘇峯之於『國民新聞』；故往嘗撰一聯，贈政之先生云：『文章自古誇西蜀，事業於今勝北巖。』擬倩人書以贈之而未果。政之先生與余雖屬同鄉而不常見，渠固至今未閱此聯也。余知政之先生不徒長於辦事，且亦擅長文筆，尤其國際問題，往往剖析入微；往日大公報僅出津版時，大概論內政者多為季鸞之文，談外交者多為政之之文，余以喜讀該報社論之故，輒能辨其何人之筆，有時欲取證於季鸞，季鸞先生恒笑而不答，此亦足見其能守該報之公約，不以私交而破例也。余所以謂季鸞先生頗似德富蘇峯者，非謂其主張之相同，乃指其文字影響之同樣宏大也。

「德富氏為雄據日本論壇之大文豪，國人頗多知之；昔梁任公先生編新聞叢報，時常喜譯其文字。當日俄戰爭時，日本軍器較俄為劣而士氣則較俄為盛，正如我國今日之抗戰，軍器雖遜於日，而士氣則遠勝於日；日本戰勝帝俄之後，其國人推原士氣旺盛之故，多歸功於德富氏文字鼓吹之力。」

「緣自甲午中日之役，李鴻章施用特殊外交手腕，運用德法俄三國干涉退還我遼東半島後，日人即痛心疾首於俄而思有以報復之，以俄在三國中實居主要地位也。德富氏

當時爲從軍記者，目覩三國干涉之事，恍然於『軍事第一』之義，認爲『力之福音』，自稱曾受『力之洗禮』，親自遼東海濱撮取一坏土，盛以玻璃瓶，歸而置諸編輯案頭，日對之而發誓曰：『如不鼓吹邦人對俄作戰再取遼東者非人也！』自時厥後，運其如椽之筆，大唱征俄之論，全國軍人受其影響，義發欲狂，閱十年而有甲辰之役，帝俄卒爲所敗。

「日皇論功行賞，德富氏竟以新聞記者救選爲貴族院議員。其人意氣自豪，垂老不衰，至今尙爲日本少壯軍人所敬禮，嘗賦詩自炫其長曰：『滿腹經綸信手裁，疏狂愧乏濟時才；何時學取韓歐筆，萬里長江一瀉來。』蓋其漢學根底頗爲深厚也。德富氏之異於季鸞先生者有二：一爲主張軍國主義者，一爲主張民主主義者，其不同一也；一爲鼓吹侵略者，一爲主張自衛者，其不同二也。然亦有相同之處：①爲屬終身從事新聞事業者。②爲同以新聞記者參加議政機關。③爲同以如椽之筆影響戰時士氣。④爲同以文人受知於軍事領袖。德富氏之見重於日俄戰時日本內閣首相桂太郎大將，亦如季鸞先生之見重於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先生。」

筆者按：德富蘇峯所創辦的「國民新聞」，就是前些月揭露中共陰謀赤化日本步驟

原文及消滅田中體制，達成解放日本詭計的那家報紙。這家報紙創刊於一八八三年，爲五日刊。前此兩次刊登獨家報導，在日本新聞界一片媚共聲中，能夠獨樹一幟，主持正義，反對田中政府的媚共行爲，可知德富蘇峯的繼承人仍具嶙峋風格，有獨到之處。

筆者按：北巖爵士 (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 1865-1922) 係英國報業鉅子，擁有新聞機構甚多。北巖氏於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五日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蔡波里佐 (Chapelizod)。他是十四口之家的長子，他父親阿弗列·哈姆斯渥 (Alfred Harmsworth, 1837-1889) 是老漢普夏 (Hampshire) 一個家族的後裔，曾在中祠 (Middle Temple) 地方執行律師業務。他的母親姬瑞汀·瑪麗 (Geraldine Mary)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去世)，一位極具智慧而有強烈個性的婦人，是威廉·馬菲 (William Maffett) 的女兒。

北巖的父親，於一八六七年帶他們昆仲移居倫敦，並讓他們上小學及中學。他開始寫文章是一八七八年，那時他才十三歲。十五歲時，旅遊歐洲。回倫敦後，就當了「青年雜誌」 (Youth) 的助理編輯。同時向晨報 (The Morning Post) 及聖詹姆士雜誌 (St. James Gazette) 投稿。

一八八四年，因健康關係，離開倫敦到康溫特瑞(Conventry)去，在伊利福父子公司(Illife and Sons)工作，這是個擁有無數出版機構的企業組織。一八八六年，他又回到倫敦，參加出版事業，以謀獨立發展。一八八八年六月十六日他開始創辦一份名「通訊員的覆音」(Answer to Correspondents)。這個刊物後來導引成著名世界的「混合出版公司」(Amalgamated Press。)「通訊員的覆音」對於後來的通訊事業發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八八九年，北巖氏週遊世界，他足跡所到之處，包括歐洲、印度、非洲、加拿大及美國。

一九〇三年，他在倫敦創辦「每日鏡報」(The Daily Mirror)。

一九〇五年封爵。一九〇六年，他在紐芬蘭投下巨資，利用湖水與木材，開始造紙。

一九〇八年他擁有了泰晤士報(The Times)。他接辦之後，更新設備，推廣業務，於是這份有歷史的報紙，有了新的轉機。他之接辦泰晤士報為畢生追求目標之一。他為了增廣銷路，曾將每份報減價為一辨士(One Penny)。可是因紙價已飛漲為百分之六百，於是又被迫加價。

這時候，他又創辦了一份週刊，名「傳訊週報」(The Weekly Dispatch)。這份刊物的創辦，是受了「星期觀察」(Sunday Observer)的影響。同時把「每日鏡報」售於他弟弟羅斯密爾爵士(Lord Rothermere)，並規定他的事業所有盈利，都按成數分配於主要工作人員，為新聞事業共同分享出資人所得利益之始。

他的報紙——泰晤士報、每日郵報(Daily Mail)與所有期刊，自一九〇〇年起，即大量刊載國內政治趨向，以及一切政黨主張。在英皇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 1841—1910)、英國殖民地資本家及南非聯邦行政長官羅德茲(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當權時代，他的新聞機構力主大批造艦，維持海上霸權。在第一次大戰之前他已是國會下院的議員，曾發表演說，再進一步主張航空報國，一個國家要有制空權。發展潛艇，也是他所有新聞機構中的強烈主張。「每日郵報」並曾以獎金方式鼓勵飛行。這些言論對於第一次大戰前的英國國防政策及建軍工作，都有巨大的影響力。

一九一五年四月至六月，大戰爆發，並且英國普遍遭受德國空軍的轟炸，頗受損傷。當時主持國防的大臣是季真納爵士(Lord Kitchener)，被北巖爵士的新聞媒介一陣痛罵，致丟冠下台。

一九一六年，他協助勞合喬治(Lloyd George, 1863—1945)把艾薩奎斯(Asquith)

首相推翻，取得政權。二次大戰時期，他遊歷英、法、比、義及美軍前線，採訪新聞，巡視戰場及報導消息，獲得國內外讀者的敬佩。他的許多主張，都經勞合喬治採納。可是後來爲了停戰問題，他也變爲這位首相嚴厲的批評者。

勞合喬治曾邀請他入閣，被婉謝。在美國未參戰時期，英國政府會希望他任駐美大使，也經他拒絕。但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二日，他接受了英國皇家的一項重要任務，那便是「不列顛戰爭使團」(British War Mission)主席之職。他領導代表團到紐約，開始工作，終於拖美國「下水」參戰，贏得了最後勝利。戰後他又竭力主張與法國維持友好關係。

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又旅遊全世界，醫生曾諄囑他應多休息，他不聽，終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患心內膜炎潰膿逝世。北巖爵士除二弟也封爵，其餘四個弟弟，均有成就，已先後去世。

如今英語系的報紙，在文字方面，無不以泰晤士報馬首是瞻。泰晤士報言論的影響力在歐洲仍執新聞界的牛耳。可見北巖爵士的風格餘蔭仍存。

×

×

×

×

×

曾氏於痛悼季鸞先生之餘，畧及政之先生，稱讚他「心精力果，得未曾有。」「大

公報之馳譽國際，雖係季鸞先生心血所致，而政之先生之擘劃，大有力焉。」以及「政之先生不徒長於辦事且亦擅長文筆，尤其國際問題，往往剖析入微。」「大概論內政者多爲季鸞之文，談外交者多爲政之文。」等等言論，極爲中肯，曾氏不愧爲深知當年大公報內情之人，所以我非常高興錄曾氏這段話，作爲本文的引言。我相信胡氏於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逝世上海時（享年六十一歲）曾氏必有專文哀悼，議論必多；可惜我一時找不到這些資料，無法使本文有更豐富的引用，至感歉然。特別是政之先生去世時，正當共軍渡江前夕，京滬震撼，江南已草木皆兵，他身後哀榮，以及一切細節，在時局陰霾籠罩下，所予世人的印象模糊，絕不似季鸞先生三十年九月六日病逝陪都時，那麼震驚全國，給人的記憶獨多。

筆者那時正在廣西首府籌設郵政儲金滙業局桂林分局，自廣西日報看到新聞後，急忙發一電報致唁。後來曾接到曹谷冰兄一封信，畧知葬埋情形。

二、再彈哀曲

三十八年元月八日，我率領全家還有幾位同事，在共軍包圍北平城中，在天壇機場冒險逃離故都。在南京住了幾天，就轉往上海。一到上海便知道政之先生已住虹橋醫院

，恰好至友趙惜夢兄以大連市長身分駐在上海辦理善後。我倆約會好於十五日上午，相偕去醫院探望他。

虹橋醫院在滬西，地點清幽，建築新穎，名醫謁集，設備良善。胡先生的病房在二樓。一敲門，胡夫人見是我們，就報告政之先生。我們走到床前，胡氏還滿面堆笑，問我們什麼時候到了上海與今後行止。又說：「一輩子沒生過病，這回病倒了！」我們見他只是面容稍顯消瘦，精神還很好。於是我們安慰了他一會兒，希望他安心靜養，早日復元。胡夫人把我送出來，才知道他得的是腎臟病（註）。胡先生身材中等，體型稍胖，平時對於飲食，毫無禁忌，興致來了，也喝幾杯。那時「糖尿病」這個名詞沒今天這樣耳熟。我想胡氏所得的一定是嚴重的糖尿病，影響了腎臟功能。這種病到今天除了換腎臟仍難保險絕對有效，那時更束手無策。我們在門外安慰了胡夫人一些言語外，默默辭別。

這回是我認識胡氏以來最後的一次見面，算來將是二十四年了。

自胡氏去世後，轉瞬又將近一個世紀四分之一的時間。大公報自大陸淪陷後，最初階段總館由津遷平，備遭中共蹂躪，不但面目全非，而一派媚共言論與顛倒是非的報導，早已不是當年的報紙。自所謂大鳴大放後，整個大陸，所有大公報機構（在一九五二

、三年時，大公報尚有渝、滬、津及香港四社）都被封閉，現在僅賸下香港一館。一些老人，如曹谷冰、王芸生、李子寬、金誠夫、孔昭愷、趙恩源、徐盈、彭子岡、高集、張遜之、李清芳、袁光中、李孝元等生死存亡，都不知下落。就是名噪一時，反叛大公報搖身一變為紅朝新貴的范長江，於熱鬧了一陣，再也不見他的名字。祇有楊剛（她是中共滲透大公報的先鋒），後以肺疾死亡，曾見諸香港報載。至於朱啓平，他與大公報關係不算深，韓戰時曾有過他的名字，後來也不再提及。

十六年前，我曾印行一本「報人張季鸞」以紀念一代論宗之死，兼及大公報同人，無非是悼傷一個有影響力的新聞記者及懷念一個有歷史的新聞機構，以為現在新聞從業員的借鏡而已。那本小著出版後，備受海內外人士之愛護，十五年來，印行三版，共銷行六千冊。然而那本書倉促間輯成，殊嫌草率簡陋，不足以表示我恭敬前輩的至意萬一。書出版後，又蒙前監察院院長于右老在青田街官邸，代我召集座談會，一面為拙著問世慶賀，一面為小書補充資料，以便有機會編入。那次到會的有前監察委員朱宗良、現任立法委員冉寅谷及王廣慶、前主計長蔡屏藩、國大代表楊爾瑛等多人。他們之中，于右老與朱委員是季鸞先生在民立報時的同事，蔡屏藩、冉寅谷、楊爾瑛三位先生則是季鸞先生的同鄉。冉、楊二氏且都是榆林人。在半天時間內，他們有的回憶當年民立報季

鸞先生工作時的情景，有的爲我敘述榆林張府往事，使我獲得許多珍貴資料，以備拙著的補充。同時，我又接到台南鹽廠周維亮先生的一束剪報，那是季鸞先生去世時，各項新聞報導跟悼念文字，是根據大公報桂林版的刊載。當時看了這些資料，並沒加以重視，僅認爲是一些資料而已。但十五年後我重新閱讀這些資料，則覺得因時間的轉移，世事的變遷，其因發酵所生的影響已與日倍增，所以我才決計編撰「一代論宗哀榮餘墨」一文，刊登去年九月號的「傳記文學」，以紀念季鸞先生逝世三十一週年。

可是若干年來每逢我寫季鸞先生時，腦子裡總有一個影子環繞，總覺得不祇應該紀念季鸞先生，還應該撰寫政之先生。季鸞先生的如椽大筆固然已影響了中國重要的時期，使大公報的地位抬高；然而如果不是賴政之先生的擘劃經營，使報紙銷行全國，可能它的影響力要大打折扣，何況胡氏寫作能力之強，絕對與張相頡頏。所以不知有多少篇社評，出自二氏何人之手，不僅讀者不能完全辨清，就是館內同人事後也幾難確定。可知張胡二氏對世事論點相同，文字技巧也多處相似。

有一個時期，季鸞先生患病，社評撰述由政之先生負責，他每天寫不同題目，所用筆調、詞彙、主張，簡直與季鸞先生一模一樣，幾乎無法辨別不是季鸞先生所寫。就是谷冰、芸生等，因受張、胡二氏多年薰陶，立論下筆的風格也與張胡二氏相倣。於是「

大公報體」成爲一時風尚，也塑造了一種文字典型。甘乃光先生曾在抗戰時期對人描述過大公報社評有一套「公式」。（先敘述，後引證，再加分析，態度不偏不倚，隨時注入中國人的感情。）雖不盡然，但大體說中了「要害」。因此任何一個大公報的從業員，多多少少都學會了一點「皮毛」。縱然沒能夠啜得精髓，却也形似。

如果說，大公報的所以成功，多靠季鸞先生的一支筆是可以的；如果說，完全靠他，也不盡然。任何事業，都需要集體合作，發揮團隊精神；尤其文人更需要合作，因文人都有顯著個性。一般事業單位，往往由一個人創辦領導，其餘人都是屬員。這種事業好辦，由一個人作主，其餘的人聽命令即可。要是兩個人合辦的事業，地位既相等，能力又不分上下，社會關係差不多，除依靠合理的制度外，還需要靠道義、修養、互信和那份堅固不渝的感情，才能維持事業於不墜，才能維持友誼於永遠！何況張、胡二氏之外，還有第三位吳達詮（鼎昌）先生？

衆所週知，自民國二十年以來，我始終以「客卿」地位，担任大公報的正式職務。在十五年內，他們都沒把我當職員看待，任何高級會議，都讓我參加；若干社務都不避諱我。因此我對社務雖不是瞭解最多之人，也非一般職員可比。

我欣幸有一個時期，目覩這三位先生共同圍在一張長型編輯桌前，一邊剝花生，一

邊談話、聊天、看稿，以及撰文等情形。當時幼稚的心扉上，只是充滿了歡欣與感動。等在報館服務年久，入世更深，才體會「合作」的意義與「友情」的芬芳。「合作」與「友情」，互為表裡，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多麼難以並存的兩項要素啊！

中國報業近半世紀以來，由個人領導成功的固不乏人，但以合作方式能使一樁文化事業，在短短期間，馳譽海內外，影響國家大計，被多數讀者念念不忘，於時代貢獻最大最多的，恐怕再難找出多少家。

因此多年以來，基於這種意義，我想拿胡政之先生為中心，舉許多實例，以發揚張、胡、吳三人的幽光潛德，合作美行，尤其是張、胡二氏管、鮑之誼，如何在中國報業史上留下美談，為我追求的目標。

但是寫概括印象易，寫一個人的傳記則難。

因此本文只想拿大公報的成就壯麗胡氏的一生；拿大公報的幾個時代，記載時局的變化；拿它的主張說明國家所面臨的一些問題。當然談論時，涉及季鸞先生的時候不會少。

我於出版「報人張季鸞」時曾說：「論資格我不配寫季鸞先生的一生。這個責任應屬於曹谷冰、王芸生等位先生！時代使然，地方使然！」

現在我仍然要說：「我也不配寫胡政之先生的一生。這個責任仍屬於曹谷冰、王芸生等位先生；然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能夠有機會，寫完了季鸞先生，再寫他老先生。討上帝的恩典，我寫這篇文章時既超過了季鸞先生的壽數（五十四歲），也比政之先生活得長（他享年六十一歲）！兩位先生九泉有知，不恥笑我的無知與無能，若能欣賞我這一片誠心，則是我馨香以祝的了！」

關於本文的題目，曾有多次斟酌，如「報業鉅子胡政之」、「報紙巨擘胡政之」等都覺得不合適。最後決定用「胡政之與大公報」是有多方面理由的。我嫌「鉅子」具有「銅臭」味道，因為胡氏並非大資本家；我嫌「巨擘」沾染着行業中霸道風光，因為胡氏並非那類人物。但外國報在天津時代無不知「胡霖」（Mr. Hu Lin），我會多次聽英、美、法國及日本人找他談話。

〔註〕據胡夫人自紐約來函，胡氏所患乃肝硬化症，非腎臟病。

三、新聞企業

現代中國報業始自清末，因教育不普及，民智未開，營業不振，新聞紙的銷路始終落後。二十世紀初期，報業在歐美早已成為企業，我們還停留在手工業及個人經營時代

。民國初年，包括上海、天津與北平，僅有少數幾家報館使用輪轉機，多數仍是平面機的天下。最大銷路也不過十幾萬份，除上海有數的幾家報館靠廣告維持業務外，絕大多數以「機關報」，靠領津貼以維持生計；因此所謂「報紙企業家」與「新聞界大亨」等等名稱，都名實不副。尤其報業界管理方面，極為落後，距離「企業」的性質，相差甚遠。

初期報業，如邵飄萍、林白水等，因政治關係成名，並非報業經營成功。黃伯惠、張竹平及史量才等為上海方面「報業鉅子」，只是表示他們曾有商業環境，利用廣告發展新聞；至於對時代的貢獻，頗有疑問。若以影響而論，則不及北平晨報的陳博生與世界日報的成舍我，這兩位都是成功的報人，為報業史留有光榮的一頁，足資矜式。其餘地方性的新聞事業，其中不乏影響一方，而且權威的組織與人物，然而畢竟未遍及全國，受多數人重視。

惟有胡氏，畢生盡瘁新聞事業，從未旁騖。他於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與張季鸞、吳達詮兩位先生接辦天津大公報以後，以科學管理、現代經營，把一個報館歇業已久、營業不振、規模甚小、藉藉無名的新聞機構，於數年之內，便躋於全國報業之林，銷行之廣，影響之大，實為空前。抗戰前開創上海館，抗戰後又創漢口版及香港版；後來又創重慶版及桂林版。在全國報業中，轉徙之勤，開闢之多，既是唯一，也是獨見。

這些事，固然大公報同人都有責任，然而主管其事，權衡利害的却是政之先生。這些經驗都不是「報業鉅子」所具有的，更不是「新聞大亨」所經歷。冒險犯難是政之先生一生最輝煌的精神發揮，積極創業更是他追求的崇高理想。我不敢說，他是民國以來報業的唯一全才，可是能夠與他匹配的，實不多見。二次大戰後，新聞事業與日俱進，不但設備進步甚多，印刷技術改良；經營的觀念與方式，也大不相同；理應有更多人才在這個時期大展宏猷，顯露頭角，以企業家的精神，開創新聞媒介的里程碑，我正以愉快的心情，拭目待之。

四、最初接觸

我知道胡氏的大名，約在中學時代。因為我自幼兒喜歡讀報，自上高小起，祖母就容許我每月花費一元三角錢在暑期內訂閱平津報紙，以便瞭解北洋軍人互相混戰的情形。民國十一年夏，我考入保定第六中學，閱報室往往由我一人獨據。我在上海與北平（那時還叫北京）的報上，常常發現「胡政之」寫的文章。知道他是個名記者，曾採訪過巴黎和會的新聞。好像那一次也只有他一個中國記者從事採訪。

後來我由保定轉往北平上學，每天還照常讀報。同時也多知道了一些平津新聞界的